杭州文史资料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五辑

133320

Yt154/28

杭州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资料）

K2506
4030

K2506
4030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 余森文（ 1 ）
于子三运动回忆片断…… 钟伯熙（ 9 ）
回忆于子三烈士…… 汪敬羞（ 18 ）
悼念于子三烈士（词五阕）…… 张学理（ 32 ）
忆陈仪…… 贡沛诚（ 34 ）
黄绍竑第一次主浙…… 沈松林（ 49 ）
我所知道的俞济时…… 汪坚心（ 55 ）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杭州市长…… 赵　晨（ 58 ）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杭州市三任市长…… 徐福三（ 66 ）
国民党杭县县长兼杭州市长陈纯白…… 任秀清（ 77 ）
教育家俞子夷先生…… 施毓英　孔庆廉（ 84 ）
俞子夷先生与湘湖师范…… 周　汉（100）
古琴家徐元白……徐匡华 徐晓英 周素子 沈奇年（103）
我的母亲章王氏…… 章　燮（113）
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简史…… 严启之（115）
解放前的杭州市天长小学…… 彭惠秀　梁广烈（122）
钱江义渡…… 俞霭士（125）
杭州城站的来历…… 陈宪清（129）
拱宸桥旧事二则…… 章达庵（131）
解放前的杭州市商会
…… 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组（134）
杭州典当业…… 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组（156）

战斗在白色恐怖籠罩下

——回忆杭州解放

余森文

当时的形势

1948年，随着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北平、天津、济南、锦州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蒋介石撕破了一切民主伪装，实行疯狂的法西斯镇压。南京、上海、杭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淮海战役我军即将全面告捷，兵临长江，南京国民党政府被迫提出假和平建议，派和平代表团到北平求和。我们党提出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蒋介石不接受，只得逃往奉化溪口，退居幕后，让李宗仁出任总统，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也开始纷纷向南逃亡。

接受任务

1948年7月，陈仪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9月我在省政府挂了一个“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住在杭州。当时国民党杭州市政府市长周象贤，是一个反动的老顽固，是宋子文的亲信。市府秘书长徐雄飞，清华大学出身。抗战期间我任丽水专区的专员时，他任松阳县县长。年轻有为，办事干练，与当地土劣不妥协，曾受地方

恶势力的围攻和诬告。我当时很大地支持了他，因此相互之间关系较密切。我同上海局单线联络的张执一同志研究，由我做徐雄飞的思想工作，要他相机起义，做好解放杭州的准备。上海局给徐的任务是：一、要安定全体员工，坚守岗位，不要逃跑；二、要尽可能地保护档案、图籍不受损失；三、要保护好一切资财及公共设施不遭破坏。

开头工作顺利

我同徐雄飞几次倾谈之后，他接受了我的劝说，同时通过他安排了地下党员史林峰同志在市府社会科工作，谢汉曾同志在税捐处工作。徐提出有的工作不便亲自进行的，可以由当时市府民政科长黄丽生去做。我对黄是了解的。我对他们提了几个要求：一、不要搞镇压，要设法暗中保护进步人士；二、要照常工作，掩护自己，避免引起旁人的怀疑，才能打击敌人；三、要尽一切保住自己的岗位，为人民保全好档案、图籍和物资等；四、要注意联系好各局、处的主要部门人事关系，系住人心。

不久，周象贤下台了。继任市长任显群是陈仪的人，思想比较开明。他到任后曾请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介绍了一批浙大学生到市府工作，起到很大的作用。如程融钜等在市府工作（一直到解放后，参加了市府的接管工作）。徐雄飞、黄丽生二人都继续留任原职。据徐说，任显群曾向他透露过：一旦解放军南下，他愿意与杭州同解放。由于任的思想开明，我们的工作进行比以前更为顺利。以上情况，我当时向上海的张执一同志反映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斗争转入艰难

蒋介石逃离南京前夕，将浙江省主席陈仪撤职，并秘密拘捕。新任主席是极反动的军官周嵒，任显群因与陈仪的关系亦离去。继任市长俞济民，是俞济时的胞弟，也是蒋介石的外甥，更加反动顽固。加上这期间从南京南逃的国民党中央机关职员和家属，经过杭州的每天络绎不绝。军统、中统特务也不断逃来杭州，其中有些无力再逃，就暂时留了下来。因此杭州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我这时难以公开露面，就把家留在杭州，以去上海同济大学讲学为名，不时去上海，以避特务耳目。

因为俞济民是警官出身，虽然当过多年的警察局长和县长，但对当市长却毫无经验，来杭前曾去上海请教过周象贤，所以一到任就请徐雄飞留任秘书长，前任的人也有不少留了下来，我们的工作因此未曾中断。

在那混乱的日子里，浙江国民党党政军的头目开始搞什么“应变计划”，主要内容大致是：一、遣散或转业大部份人员，保留少数精干，便于行动。二、派“忠实”骨干二、三人潜伏下来，必要时准备上山。三、撤走重要档案，藏匿于乡村，其余烧毁。四、搬迁重要物资不得留下等。此时市府内外人心极度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事有凑巧，俞济民到任不久的就请假回奉化娶新夫人，我们就抓住这一时机，通过徐雄飞从各种渠道，用各种方法，将人民解放军的八大政策文件，向市属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工商界，金融界广为传播。还不时举行一些有关时局的座谈会，分析当时形势，人心开始镇定下来。其中有几次在市教育局长钟伯庸的办公室内举行，有市各局、处主要人员参

加。徐雄飞约我去参加。到会的都是些愿意坚守岗位、准备迎接解放的人。我在会上分析了形势，介绍解放区的主要情况，解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坚定了信心。

当时伪法币极度贬值，等于废纸，市捐税收不起来，市属员工薪水两个月未发，纷纷请求秘书长解决。徐雄飞暗示他们向俞济民请愿。俞慌了手脚，急找徐雄飞和财政局长吴益逊商议。徐从伪中央银行浙江分行行长张忍甫处得知，尚有库存银元还未运走，于是建议俞面请周嵒借用银元十万元救急。结果周批了五万元。当即发给员工每人银元十四元，尚余一万余元，俞要留作机动用。这次集体请愿，市府中、下层员工中出现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的组织，徐雄飞要黄丽生参加。这个联谊会表面上只办一些员工生活的事，实际上起着共同保护公有财物的作用。

临 近 解 放

百万雄师过大江，江南人民等待着解放，杭州市民也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等待着局势的变化。省党政军机关已开始撤退，先以大桥南岸为落脚点，然后退往定海。市府俞济民秉承周嵒的旨意，也准备撤往定海。此时俞已内定为杭州撤出后的浙东行署主任，他命所属主管人员全部随行，继续工作，市府及所属局处的档案、图籍、物资等，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要烧毁。当时我们掌握的确实情况是：主管人员除工务局长、警察局长及少数俞的亲信外，都不愿意随去。发电厂、自来水厂、公共交通公司、电话局、广播电台等，经过密切联系，都有了各自的护厂组织，可保安全。档案室、电话总机室都布置了妥当人员严密保护，不会有问题。

俞济民要将全市的地籍图册亲自带走。地籍图册是掌握地方政权的重要工具，必须千方百计拿到手。我们商定由黄丽生通过地籍图册保管员李宗先，用另一份已作废的旧地籍图册从图册箱里把那份完整的地籍图册调换下来，藏于市府夹墙中。此外，徐雄飞还从省中统特务头子俞家镛与俞济民来往的机密文件中，截获了留杭特务名单一份。此件以后由我亲手转送市军管会。

4月30日晚，俞济民在市府召开了紧急会议，下达撤退命令。次日先运走库存银元一万余元，那两只装着旧图册的箱子也被运走了。到5月2日俞动身前，要徐雄飞与他同行，徐在危急中脱身隐匿，与我在电话中秘密取得联系，留黄丽生在外作随机应付。待俞怆惶离杭后，市府及所属局处的一切档案、户、地图籍机要，以及电话总机等重要物资，就都保全下来了。

临近解放时，杭州一部份省、市参议员及工商、金融界人士吕公望、张衡、金润泉、张忍甫等联合组织了一个“杭州临时救济会”，设在杭州市参议会内，准备在省、市政府撤退后，临时维持地方秩序，安定人心。因为市政府实际上并未撤退，一切联系仍旧通过市府电话总机室，传向各机关、各基层和社会各界。因此“临时救济会”也就没有起过什么作用。解放军进城后不久就解散了。

保卫钱江大桥

1949年2月，林枫同志来杭和我第一次会面时，谈到做好钱江大桥保护工作的问题，要我注意敌人的破坏。4月，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南下经过杭州，又谈到发动铁路职

工保护大桥。4月下旬听到沪杭铁路桥梁被炸的消息，我们就意识到钱江大桥也不能幸免。我从林枫同志那里得知浙赣铁路局方面也有职工保护大桥的计划。4月30日，敌人将炸药运往大桥南岸，由省府工兵营负责炸桥任务。我从徐雄飞那里证实了这一消息。在此紧急关头，当天晚上，我就去找当时还住在杭州的原黄绍竑旧部工兵营杨营长。在他家里得悉：现在的工兵营还是原来驻在丽水多年的人马，主要还是广西兵，他们都认识我。在他陪同下，我们找到营负责人张××（名字已记不起），见面之后，我诚恳地劝他要保全大桥，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免为子孙后代咒骂。起初他脸有难色，感到军令难违。同时大义所在，对大桥职工的诚恳劝说亦不能无动于衷。最后商定不炸要害，这样既可应付上司，又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他表示愿同营、连骨干研究后再奉告。4月30日清晨，大桥职工发现桥上第五、第十孔钢梁上已捆绑了许多黄色炸药，于是，炸桥与反炸桥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5月2日晚我们再次交谈时，他们表示：由于周嵒、俞济民均在桥南，要看到桥炸后才离开（事后我们得知周嵒早已逃之夭夭了），只有将炸药从下层铁路钢梁上移到上层公路桥面上，不炸要害，修复不难，这是两全之计。张还告知，大桥职工都坚决要求不炸桥梁，我一再和他们商量处置，决不干对不起人民的事。5月3日下午2时半，市区内听到了从桥方向传来的爆炸声。大军进城后，立即前往查看，果然大桥钢梁完好无损，只有靠南岸第五孔和第十孔公路桥面被炸，这两孔都是木板桥，敌人在工字梁上都绑了些炸药，被炸的部位只受到轻微损伤。

大军进城

5月3日，天气晴朗。下午2时许，解放大军由西湖区方向进入市区。21军军部首先进驻市府，徐雄飞等迎接了军长滕海清等一行，并在布置城防中协助了工作。我在接到徐的通知后，立即面见滕军长。当滕了解到电厂、自来水厂、公共交通、电信、电台等完好无损时，立即派部队进行保护。同时还接见了警察局督察长马瑞文及分局长池桂生等，要他们继续严守岗位，维持好市区治安秩序，因为解放军大部驻在四邻，并不进城。另外通知公共交通公司经理朱克华调拨了部份车辆，支援解放军部队向德清方面的紧急运输任务。当时还有一部份浙北师管区的残部退到下城区一带，当由军部派部队接受投诚。傍晚，军部移入民生路国民党省党部内，并立即经由电台发布了《告全市人民书》。至此，未发一枪，不流一滴血，不损一草一木，杭州市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解放！当晚市内街灯通明，次日街市大部份商店照常营业，往来行人热闹。这是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声威和政策深入人心的结果。两天后，军管工作人员亦陆续到达。21军向前推进，城防由七兵团派部队担任。

杭州属于人民

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林枫同志于5月7日约我见面，我把几天来杭州解放前后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据回忆，谭主任对徐雄飞等人的工作深表嘉许。军管会开始各部门接管工作后，徐雄飞被派接收工商报社，以后又派为市福利会秘书长，不久徐经中央财经领导同志介

绍去北京，在中央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黄丽生被派为军管会房管处秘书，其余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也都作了适当的安置。这里还要提一提，国民党杭州市党部书记长朱一青等，在杭州解放后，亦立即携同国民党员名册、区党部、区分部的组织概况、财产目录等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于子三运动回忆片断

钟伯熙

1947年夏季，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人民解放军从7月开始了战略反攻，敌人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御，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在广大的国统区，由于党所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日益壮大，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商人罢市，反征兵、反征粮、反苛捐杂税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的战略后方。什么选举伪“国大”，制定伪“宪法”这套欺骗人民的把戏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蒋介石政府为了稳定后方，脱去了全部伪装，对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全面的残酷镇压。1947年5月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7月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各地成立了专门对付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特别刑事法庭”。伪《中央日报》公然刊登了《操刀一割》的社论，发出了血腥镇压的信号。当然，他们决不肯放过眼中钉的浙大学生自治会。1947年10月26日乘担任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于子三参加校友婚礼之际，在杭州延龄路（现改延安路），大同旅馆逮捕了子三和其他三位同学。

消息传来，学生自治会理事会连夜召集了紧急会议。我们一年级同学会的干部也都参加，发表了告全市同学

书。浙江区学联也发表了书面谈话。以竺可桢校长为首的学校行政出面奔走营救，校方报纸《浙大周报》专门出了号外。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事变，那几个晚上我们很多人都寄住在校本部，与理事会的同学一起战斗。敌人一方面玩弄推托、拖拉和欺骗的阴谋，一方面对于子三进行突击审讯，严刑逼供。三天以后（29日）子三同志终于被刽子手们杀害于上仓桥伪浙江保安司令部的拘留所里。其余的三位被捕同学，由于竺校长的据理力争，被移交给伪高等法院候审。

我永远不能忘记10月30日拂晓，那阵经久不息的钟声，这深重而又响亮的钟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它哀悼了又一位革命青年的牺牲，它也预告了垂死挣扎的敌人之最后覆灭。一千六百名师生紧急集合，站在秋风萧瑟的广场上（后来这个广场改名为子三广场），听竺校长报告他前一天晚上带病探狱的经过。竺校长最后说："竺鸣涛（伪浙保司令）要我签名证明于子三同学系自杀，我不能签，因为我只看到了于同学的死亡，而不能证明他的自杀。"接着由校医主任李天助教授（现在浙医大二院工作）介绍了他作为浙大代表验尸的情况。李先生从科学鉴定的观点分析了于子三遗体各个部位的迹象，斩钉截铁地作了"不属自杀"的结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竺校长和李先生这样以公职人员的身份，公然主持正义，所冒的危险是很大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非常感动人心的。全校师生听了这个噩耗，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冲击，顿时哭声震天，使接着发言的学生会代表的发言多次中断（报告人自己此时也已泣不成声了）。莘莘学子，爱国何罪！于子三同志的牺

牲，使为数众多的中间师生擦亮了眼睛，一些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教授和同学，此时此刻终于在烈士的鲜血中认清了什么是蒋介石的“民主”和“自由”，认清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才是全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我最近收到（原浙大师长）北京大学严仁赓教授的来信，提到于子三事件，摘录如下：“于子三被害，使我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激起我的仇恨，从此才坚决站在进步同学一边，也开始同浙大地下党取得接触，接受党的教育，并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可以说，子三事件是我后半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转折点，不论思想上、行动上都是如此。”如实地反映了老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在后来的于子三运动及迎接解放的斗争中，一些甚至在“五·二〇”时期还在抱“中立”态度的老师和同学都纷纷参加了斗争的行列，在人数上相对多数转为压倒多数。这种政治上一面倒的局面出现，是愚蠢的敌人所万万无法预料的。在全体大会后，各种社团，包括学生自治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劳工福利会和研究生联合会都发表了宣言和声明，当场宣布罢课罢教。全体师生排着长队，向“浙保”进发，与子三烈士遗体告别。当时杭州全市已经戒严，从大学路、庆春街、中山路、鼓楼直到上仓桥，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岗哨。到了“浙保”司令部附近，更是内内外外好几层上着刺刀的士兵，如临大敌，命令师生们以一路纵队鱼贯而入。以学生自治会的干部为前导的学生队伍，因为人数

多，足足化了一个多小时，才从伪司令部一扇边门里退出，出来后又重新整队，默默地从原路游行回校。在我们来到之前，子三的遗体已从拘留所里移出，放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小棚子里。棚子里除了子三的遗体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子三身上穿的是那套旧的黑呢制服。咽喉上的创口洞张着，但血迹很少（人死以后再割的洞，自然不出鲜血），两眼半睁着。子三是含恨而死，死不瞑目的！血淋淋的现实摆在眼前，有几位女同学因过度压抑而昏倒在地。停尸场里气氛是异常肃穆的，只听到慢慢移动着的脚步声，人们已经流干了眼泪，留下的只有悲愤和仇恨。亲爱的祖国，古老的民族呵，为了你的彻底解放，还将要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你抛头颅洒热血！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每当我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遭遇挫折而感到懊丧的时候，当年的情景就在我的脑际重现，使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责任而重新鼓起生活与斗争的勇气。

那次探狱，事先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同意了敌人几个条件，即沿途不喊口号，不贴标语，不唱挽歌。至于发宣言、戴黑纱等则在时间上根本来不及做准备。但由于子三被捕一事，在他牺牲后早已向各界人民作了宣传，上千人的队伍，经过了半个杭州市区，默默的游行队伍，本身就是一次向敌人的大示威，向人民的一次大宣传，这是完全符合白区工作中对敌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有人以此为借口，攻击当时地下党是什么“投降主义”，是“怕死”，是“活命哲学”，难道让赤手空拳的学生去冲打重兵把守的“省保安司令部”才是最最“革命”的行动吗？这种恶意攻击，

不是无知得可怜，就是别有用心。更有甚者，有人捏造事实，侮蔑于子三烈士是“叛徒”，是“自杀”，而把过去早已为事实所肯定了的被杀，反而说是“阴谋”。他们对当年主持公道的李天助同志横加迫害，甚至对竺校长也散布流言蜚语，全盘否定于子三运动。三十年前国民党说于子三是“畏罪自杀”，这些人现在也说子三是“自杀”，他们究竟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讲话，为谁在翻案，不是一清二楚吗？

为了化悲愤为力量，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组织了治丧委员会，举行公祭，组织了全校性和局部性（有的由各学院的学生会出面，有的由各社团出面）的各种哀悼晚会等有战斗性的文艺活动。演出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聂耳和贺绿汀等的作品，如“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游击队员之歌”，也演出了“白毛女”全剧；更多地演出了当时流行在国统区的革命小节目，如“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跌倒算什么”、“茶馆小调”、“古怪歌”、和“拉壮丁”等，有力地鼓舞了斗志，团结了群众。同时组织了有各院系、各班级同学参加的全校性纠察队。在校门口和校内各部门组织了纠察线，防止特务和反动学生破坏罢教罢课。纠察队除在学校日夜守望外，还抽出部分队员负责保持与市内各大、中学校的联络工作。治丧委员会最后决定于1948年1月4日为子三烈士公开出殡安葬。

经过校方出面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反动政府原先正式同意出殡，但是在1月4日早晨，反动政府突然翻脸不认帐，调动大批军警包围浙大。这时华家池的同学早在拂晓前

赶到浙大本部，但市内各大专、中学来参加出殡的同学，大多数被在路上堵截住了。反动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浙大师生孤掌难鸣，就悍然对浙大师生下了毒手。一声呼哨，从庆春路、华藏寺巷和图书馆，分三路，各有几百名特务暴徒在军警的掩护之下，手执军刀、刺刀、手榴弹和钉着铁钉的大木棍（那时各地同学把它取名为“中正棍”）破门而入，对赤手空拳的师生进行血洗。由于敌人来得凶猛，立刻就有二十几位同学（大多是女同学和身体弱小的同学）重伤倒地。我亲眼见到在我旁边的电机系同学韩桢祥（现在浙大任教）头上被铁棍打了一个大洞，血流满面，昏倒在地。体质较弱的药物系女同学张淑改（地下党员）被特务残酷地打倒在地下，并灭绝人性地用皮鞋脚猛踩她的胸部，当场踩断肋骨三根，口喷鲜血。我和另一纠察龚溶同学（有名的“龚大个子”）也都在头上挨到了不知从哪里丢来的砖瓦石块。正在骚乱的时候，站在离我约十米左右的老教授舒鸿先生突然跳上阳明馆（教学大楼）的台阶，昂起他那已经眉发全白了的头，振臂高呼：“你们怎么不能打他们，大家打啊！”他这一呼喊，大家立刻冷静了下来，马上由纠察队带队，对敌人进行了反包围和反冲锋。真的，我们有一千多人，他们只有几百，怕什么！反正不打也是这样，打也是这样，哀兵必胜。大家此时眼都红了，秀才造反拼命了。敌人没有思想准备，几十分钟的混战后，匪徒就溃逃了，当场就被我们抓住了十几名，其中包括几名穿了制服的伪治安警察。有几个原来正在追打女同学的特务，反被围在阳明楼的顶层上。要不是举手投降，真的会被从大楼上推下窗口来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